

## 浅论唐李寿墓室石刻艺术

张伯龄

1973年,从陕西省三原县陵前乡焦村的李寿墓内,出土了墓门、石椁和龟形墓志等石刻<sup>①</sup>,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陈列室,这些石刻造型奇特,雕刻内容丰富,形象简洁概括,线条粗犷豪放,是初唐时期很有代表性的一组作品。

李寿墓门,由门楣、门颊柱、门扇、门槛、门墩等八块石头组成。通高213厘米,宽177厘米。尖拱形门楣上,浮雕灵龟的头部和两肢,并有几朵流云,使灵龟更增加了生气,并刻了两朵番莲和以莲花为中心的一排果实累累的波浪式葡萄纹饰。一对门颊柱支撑着门楣,颊柱上三面减地薄浮雕上加线刻抱合式蔓草花纹,柱下端线刻一个兽面。门槛里外两面花纹和颊柱上的花纹相同,上面线刻波浪式蔓草纹,正中亦刻有一个兽面。门墩又支撑着整个石门,门墩上是一对雕刻精美的小蹲狮,一个张口怒吼,一个闭口凝视,座前线刻一只生动的奔兽及忍冬花。门扇正面刻三排门钉,上边浮雕一对变形的花丽的朱雀,下边浮雕一对写实的展翅傲立的孔雀。造型简练精确,构图刚健空灵,是初唐少见的一幅极好的装饰画。门楣的背面线刻忍冬花和葡萄纹。门扇的背面,线刻一对披甲的天王,一个手执降魔三股杵,另一手持剑、戟,威风凛凛,气度非凡。天王为护持佛法之神,因而头上刻有光环,脚下踩着被降服的鬼魅。作品真力弥漫,刀笔劲健,具有屈铁盘丝的雄强之势。这幅线刻画不是抽象的线条,而是人物形象,颜面手足,衣着佩带清晰准确,是一幅完整的白描人物的翻刻。这种线刻并未借助明暗、浮凸和色彩,便可充分塑造出形神兼备,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。

李寿石椁,高220厘米,长355厘米,宽185厘米。整个石椁由28块青石组成,外形是歇山顶式的房屋建筑,特殊的是在椁的前面正中,安装着两扇可以开合的石门,门楣上部线刻和龟形墓志及墓门上相似的灵龟形象,周围线刻蔓草纹。石椁外部采用减地平浮雕的形式,并以粗犷的线条加饰细部,四面雕刻四神,执剑武官,捧笏文官,执戟武士,骑龙驾凤游于山岳或升入云中的仙人等,石椁后面还刻有一个门,门上刻一对铺首,一对孔雀,造型和墓门上的孔雀相似,门额上龟蛇组成的玄武,张口呼应,生动异常。椁底四周线刻十二生肖,周围装饰山峦树木,造型丰硕,线条流美,浩荡之气溢于画面。并在生肖图之间刻一幅线条挺秀、转折有致的番莲图。石椁里面全部采用线刻的形式,在椁壁和相连接的倚柱上,雕刻着一组组舞伎、乐伎、侍女、内侍、男女侍从、星相等画面。舞伎图,刻画6个少女,头梳双环花髻,身穿曳地长裙,缓步轻移,正在翩翩起舞。另有由12名女伎乐组成的立部乐队,分立三排,所持乐器有笙、排箫、竖笛、铜钹;横笛、篳篥、琴、箏;曲颈琵琶、直颈琵琶、箜篌等,女伎身着短襦长裙,婷婷玉立,倾心地演奏正在进行中。12名跽坐演奏的女伎,头梳低螺髻,身着窄袖长裙,披巾,分列三排,各持箜篌、直颈琵琶、曲颈琵琶,箏;笙、横笛、排箫、篳篥;铜钹,答腊鼓,腰

鼓,贝等乐器,当属唐代宫廷的坐部乐。刻线舒畅流利,形象优美,真实地刻画了唐代宫廷音乐歌舞的盛况。

石椁内的线刻侍女图,由 18 名侍女分列三排,侍女们统一的发式为低螺髻,盘顶呈扁圆形,身着紧身短襦,肩搭帔帛,束曳地长裙上紧下宽,履头翘露裙外。各人捧着不同的生活用具如食盒、食盘、小罐、拂尘、羽扇、几、橙、被、褥、灯等等。另一幅男侍图,由 21 名男侍拱手俯首分站三排,这些侍从们装束相同,头戴幞头,身着圆领胡服,足蹬高靴,其中有 10 个人的衣服上,还装饰着圆圈纹构成的花边。使用简单的线条,勾勒出不同年龄,久居深宫的一群随时听从主人召唤的侍从形象。特别是在石椁内的倚柱上还刻着不少手持不同形状扇子的侍女,有团扇、方扇、羽毛扇等等,是研究唐代扇子文化的可贵资料。倚柱上还雕刻了三个弯腰屈膝、面相丑陋的宦官形象,简单的线条,将人物勾勒得惟妙惟肖。

石刻线画,是我国古代随着建筑石材的广泛使用,而产生的一个画种,最初是始自汉代,由墓室画像石逐步应用到各种石材制作上,以南北朝至隋唐为鼎盛期,石刻线画的种类很多,从墓室、棺椁、碑志到门楣、柱础,以至佛教、道教的造像台座等,几乎都刻有内容丰富的装饰画或独幅画,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研究价值。唐代石刻线画以构图富丽和刀法流利见长,它在造形上和线的运用上,多是由朴质雄劲,逐步变为优美细致。刻线粗犷有力,人物面部的刻划很简单,而多在人物轮廓上去追求奔放的气魄和飘洒秀逸的仪态。线条的运用,是中国绘画、雕刻特有的风格之一。李寿石椁上的线刻画,朴素而有变化,刀矧简练利落,线条柔和而遒劲。人物造型修长,留有隋代遗风。

同时,石刻线画也是我国古代绘画与雕刻结合运用的一种艺术形式。它以石为纸,以刀代笔,兼有绘画与雕刻二者之长,非有深厚功底,不能刻画出造型准确优美,线条婉转圆润,刚柔和谐,不容修改的线条轮廓,是我国古代宝贵的艺术遗产之一。

李寿墓志,长 166 厘米,宽 96 厘米,高 64 厘米。外形为灵龟形,以龟甲为志盖,篆书阳文“大唐故司空公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”16 字,分刻 4 行,每行 4 字。盖题四周线刻联珠和蔓草,联珠以外雕刻六角形的龟甲纹。龟身镌刻志铭,楷书志文 31 行,行 37 字,共 1071 字。龟头、龟尾和龟身连接,龟的四足趴伏于长方形的底座上,龟头前伸,双目圆睁,两耳贴首,两角卷曲,獠牙及门齿外露,生动的刻划出一个“灵龟”的形象。底座四周线刻富丽流畅的蔓草纹饰,雕工精致,是唐代墓志中绝无仅有的珍品。

把墓志雕刻成如此逼真的龟形,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对龟崇拜的结果。在原始氏族时代,龟是诸多氏族部落所崇拜的图腾。龟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丰功伟绩,我国古籍中多有文字记载,如神龟帮助女娲补天;向伏羲献八卦,《周易·系辞上》记:“河出图,洛出书,圣人则之。”传说伏羲氏时,有龙马从黄河出现,背负“河图”,有神龟从洛水出现,背负“洛书”。伏羲根据这种“图”和“书”,画成八卦,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之典“河图洛书”的由来,也成为古代儒家关于《周易》和《洪范》两书来源的传说。还记载龟曾帮助夏禹治水,《洛阳记》曰:“禹时有神龟于洛水负文列于背,以授禹,文即治水文也。”《拾遗记》也曾记:“禹导川夷岳,黄龙曳尾于前,元龟负青泥于后,元龟河精之使者也,龟颌下有印文皆古篆字,作九州山川之字,禹所凿之处,皆以青泥封记。”

在我国古代称龟为四灵之一,《礼记·礼运篇》记:“麟、凤、龟、龙谓之四灵。”汉代王侯及秩比千石以上高官之印皆用龟钮。魏晋南北朝不少帝王的墓碑都采用龟趺。北魏孝明帝元诩还于公元 518 年,将自己的年号由“熙平”改为“神龟”,这是我国古代龟崇拜的空前创举。

唐代,在继承前代崇龟遗风的基础上,把龟崇拜推到历史的最高潮,把龟形、龟权和龟威,直接标志在官员的服饰上。《新唐书·车服志》载:“高宗给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,以防召命之诈,出内必合之。三品以上金饰袋。垂拱中,都督、刺史始赐鱼。天授二年,改佩鱼皆为龟。其后,三品以上龟袋饰以金,四品以银,五品以铜。”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亦载:“贞观五年八月敕,七品以上服龟甲双巨十花绶,其色绿。”“天授元年九月,改内外所佩鱼并作龟。久视元年十月,职事三品以上龟袋,宜用金饰,四品用银饰,五品以铜饰,上守下行,皆以官给。”

同时,唐代对碑碣也作出相应的规定。《唐六典·尚书礼部卷第四》记载:“碑碣之制,五品以上立碑;螭首龟趺,趺上高不过九尺。七品以上立碣;圭首方趺,趺上高不过四尺。”

唐人也以龟命名为时尚,唐高祖的儿子李智云,曾以济南公李世都之子李灵龟为嗣。隋大业中,为太原鹰扬府司马,以兵隶高祖麾下的刘政会之七世孙,亦名为李崇龟。还有唐代诗人陆龟蒙、李龟年等等,均取龟长寿、祥瑞之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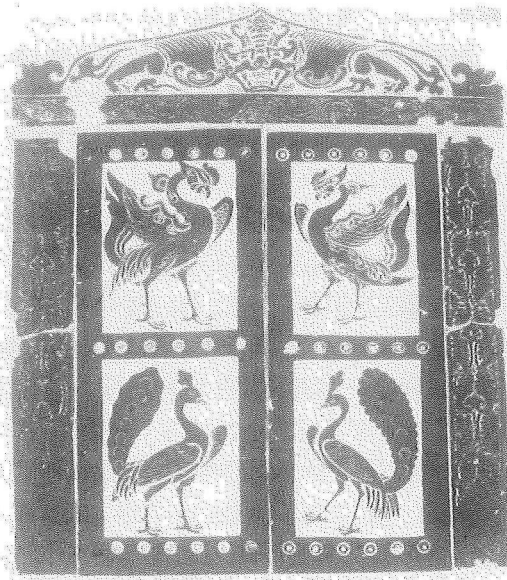
综观历代诸多关于龟的记载,即可清楚地看到自古以来,由于龟的神力和功绩,博得人们的崇拜和信赖。因而将李寿墓志雕刻成灵龟的形状,仍然是出于对龟的祈求和寄托,以求死者安宁,并使陵墓得以长久保存。志铭中所书之“懼溟海之为田,悦佳城之见日,式铭贞石,以纪芳猷。”“仙鹤方至,灵龟是考。”便是明证。

李寿墓的石刻,在1973年初出土时,尚可在石椁,石门和龟形墓志上,明显的看到残存的贴金和彩绘,可知当时石刻的原貌。

关于李寿,《新唐书》和《旧唐书》中均有传,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和《唐会要》中亦有记载。参照墓志,可知李寿(公元577—630年)字神通,是唐太祖景皇帝李虎之孙,郑孝王李亮(李虎之长子)的嫡子,即唐高祖李渊的堂弟。因在隋大业末年,会同李渊在京师举兵反隋,虽未有显赫战功,但屡屡参战,对唐王朝的建立仍是有功之臣,因而,得到李渊和李世民很高的赏赐,爵位不断得以升迁。李寿先后被授为光禄大夫,封赵兴郡开国公,为招慰大使。义宁元年(617)十一月拜宗正卿。寻迁左领都督,总知皇城宿卫。武德元年(618),拜右翊卫大将军,封永康郡王,寻改封淮安郡王,为山东道安抚大使。武德四年(621),授河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。武德五年(622),拜左武卫大将军。贞观元年(630)十二月,薨于长安延福里之宅第,春秋五十有四。唐太宗李世民为之废朝,赠李寿为司空,谥曰靖王。并获得陪葬献陵、配飨高祖祭庙的殊荣。

#### 注释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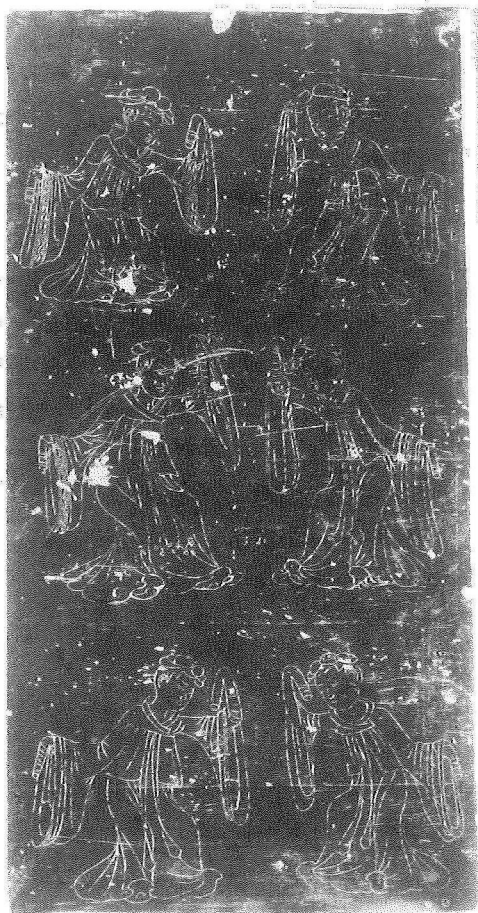
①陕西省博物馆、文馆会:《唐李寿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1974年9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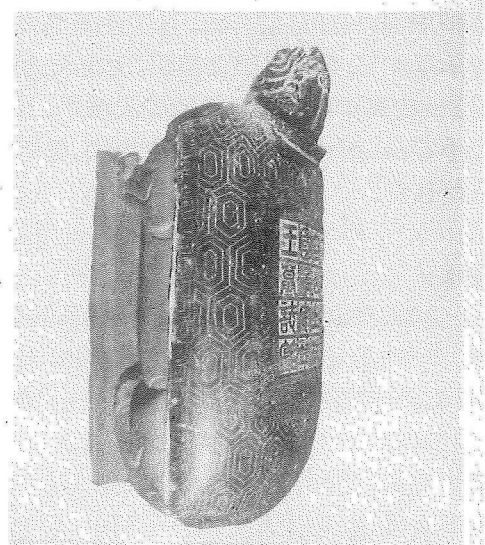
李寿墓石门



李寿石郿外浮雕



李寿石郿内线刻舞蹈图



李寿龟形墓志

(摄影:杨娟)